

郑鸿生 作品



寻找

大范男孩

郑鸿生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013070592

K295.8

36

寻找

大范男孩



郑鸿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K295.8

36



北航

C1678109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大范男孩 / 郑鸿生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8

ISBN 978-7-108-04386-3

I. ①寻… II. ①郑… III. ①社会史-研究-台湾省-现代 IV. ①K2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0365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冯金红

装帧设计 张红 朱丽娜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 数 160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46.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北航

C1678109

“郑鸿生作品”前言

郑鸿生

我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升上初中之后才真正开始上中国地理课。原因是台湾那时从小学升初中要通过联考，而且据说为了减轻学童负担，就只考国语与算术两科。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效果：小学课程里的其他科目包括地理课的时间，几乎全部被学校挪用用来加强国语与算术。尤其是五六年级时，我们整天都在上国语与算术两科，下课后的补习与回家的作业也全都是。

因此，在那个年代升上初中是个大解放，不仅不再需要补习，下午四五点就及早放学，课程也一下子多了起来，除了国、英、数之外，还有博物、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工艺、

体育，五花八门。而其中一开始就上的是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对战后婴儿潮的台湾新生代而言，这是完整的中华民族教育的真正开始。

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接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讲下来。中国地理则从有着三十五省，还包括“外蒙古”的一张地图讲起。这张中国地图以其形似而被昵称为一叶秋海棠，而不是一只老母鸡，东北有九个省而非三个。然而这张地图上面的铁路线纵横不过数条，稀稀疏疏。可以说，这张地图是被凝固在一九四九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却是我们学生用以认识中国地理的基础。

我还记得，少年时候看着中国地图上稀疏的铁路线，比较着欧美日等国密集的铁路网，曾经就在这张秋海棠式的大地图上，想象着从这城市到那城市连起一条条的新路线来。那时铁路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交通建设，詹天佑是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这是初受民族教育的台湾少年的共同记忆。

其实，这类民族教育在年幼的时候就已陆续出现在小学的国语课本上，即使是零零碎碎的，效果还是蛮大的。我记得还是七八岁时，下着大雨的日子，下水道不通，尚未铺上柏油的巷子满是泥泞，我和邻居几个顽皮小孩在雨中玩起了“大禹治水”的游戏。“大禹治水”是我们从学校的不知什么课上刚学到的故事。

然而这样的民族教育有个明显的缺漏，那时两岸剑拔弩张互相对立，我们学到的中国历史与地理是在那触摸不到的“神

州大陆”。这个触摸不到的感觉，这种对立，也是很早就知道的。也就在那玩儿“大禹治水”的日子，大约是念小一的一九五八年，学校有次举行防空演习——当得知敌机将要来袭时，学生要如何疏散躲避。我那时担任小排长，除了负责在班上收取坐同一排课桌同学的考卷外，就是在放学时将这排同学整队带出校门解散。演习是在上午举行的，我只听到老师突然说“敌机”来袭了，我们要疏散躲避。事出突然，我以为“敌人”真的来袭，就糊里糊涂地把这排同学整队带出学校解散回家了，大家都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其中有几个同学住得远，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玩耍，我就把他们带回家玩弹珠、看小人书，以为这就是“敌人”来袭时我们小学生该做的事。就在看小人书、玩弹珠的时候，我们竟也争论起“敌人”是否真的攻来了，因为我们也注意到街头巷尾的大人们一无动静。记得几个小鬼头还在为金门、马祖防御坚强、敌人是否过得了那一关而争辩。接着就是老师发现防空演习的结果是弄丢了一整排同学，赶忙派人四出到各家一一带回学校，继续上课。两岸的隔绝与对立在那幼年时刻就以如此的方式铭刻于心了。

国民党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对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的影响是如此重大，我读高中的六十年代末期，还有同学组织的地下社团取名“丹心会”，志在“恢复汉唐雄风”。丹心会之名自是取自文天祥《正气歌》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显示出民族教育的刻骨铭心。当然这样的教育方式也有其反作用，当年受过这种教育影响的我们这代人后来有不少却走

上了台湾民族主义之路。然而无论如何,对活在当年庸俗、自利、谨小慎微的庶民社会中的台湾青少年而言,民族精神教育的确是生命成长的第一个启蒙力量,它鼓励的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

二

我们家住在台湾南部老城,是日本殖民政府曾经费大力气进行现代化改造过的地方,至今留下甚多类似于上海外滩的十九世纪欧式建筑,这些建筑现在已被定为“古迹”。在家里,我们不像外省人家庭,难得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然而到了学校之后,我们这些战后新生代的学童却顺利地接上了那套民族教育,接受了五千年传承的历史与一叶秋海棠的疆域,以及两岸严峻对立的现实。

我们的父母辈是经受过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一代,而且是台湾的第一代现代化人,他们对周遭事物与文化的判断标准为是否现代化,追求的是现代化的产品,对传统文物则比较轻视,例如他们要听西方音乐,而不看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这些地方民俗对他们而言代表着落伍。此外,他们所接受的现代化教育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其中基本没有中国历史与地理的位置,可说是一套断裂的教育;而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又让他们对“国府”离心离德,更不用说去接受“国府”的那一套民族思想了。

然而他们的子女却顺利地连接上了那断裂过的历史与地理

教育，虽然现实上是再一次的分断。如今想来，这么一个重新连结也并非只是从上而下的灌输，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其实就有着诸多潜移默化的民族因素，例如街头巷尾的庙宇、在庙埕搬演的歌仔戏，还有那幸存的孔子庙的主体建筑。而那些没有被日本现代化教育严重影响的台湾人还大量存在着，包括算是前清遗老的我的祖父母辈，以及数量更多的农民、工匠、小生意人等中下阶层，这些人里面很多是不识字的。

我成长所在的台南城因为华南移民的缘故，庙宇林立。与我家隔几户就是一座妈祖庙，叫朝兴宫，往另一个方向走没多远又是一座小庙关帝厅。这两座庙宇在前清时代都在附近别处，而且规模大很多；是因为日本殖民政府要在传统格局的台南城里开辟现代马路，修筑现代建物，而被迫一再搬迁，最后幸存于被大马路围起来的传统小巷弄里。

这些偏处一隅的庙宇最热闹的活动就是节庆时的酬神野台戏了，主要是歌仔戏，也会有布袋戏（闽南偶戏）。小小庙宇五脏俱全，狭小庙埕里搭起临时戏台，提供周遭居民各种历史与神话故事的声光娱乐。为配合居民作息，演出一般都在晚饭后开始，直到深夜。锣鼓震天价响，唱腔如泣如诉，但似乎并没人家在意或抗议。只有隔天一早还要上学的小孩比较“苦恼”：往往一出戏正看得入神，却被家人抓回去睡觉！除了我们这些凑热闹的小孩外，大半观众就是我的祖父母辈，以及文化水平较低的市民。而父母亲那一代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是不会来看这些传统野台戏的。

一九六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年是郑成功“开台”三百周年，原来被限制的妈祖绕境活动利用这个时机争取开放了。台南市所有大小妈祖庙宇全部出动，“迎妈祖”的盛大队伍弯弯曲曲，绕着台南城里狭小的古老街巷，到每一家躲在里面的妈祖庙巡礼，其中当然也包括朝兴宫。巡礼队伍每到一处，都会把小巷弄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炮声震耳，硝烟迷漫。那真是盛况空前，野台戏连演了好多天。

在这次的野台戏盛会中，有个晚上竟然来了一班京剧团。不同于歌仔戏较为斯文的小生小旦，这次出场的竟是一群武生花脸。那些大花脸角色呈现出的各种京剧脸谱以及深厚的重低音，虽然未能让台下的老祖母们全了然，但戏台上的人物与故事倒也都是熟识的。而花脸们头顶上一堆晃动的小球球、背上插的一排飘舞的三角旗、手执的各色兵器以及铿锵的锣鼓声，更让小孩子兴奋不已。据说这场戏是特意为庙里喜欢看武戏的另一尊神祇“池府千岁”安排的，主事者为避免在这场盛会中冷落它，特别找了京剧团来搬演。后来我才了解，以前通常是找用官话演出的北管乱弹戏班来演的，只是因为前清时期在台湾盛极一时的北管乱弹大戏渐趋式微，六十年代的台南地区很难找到戏班，只好找一个唱官话的京剧团来代替。在地方民俗的层次，各地的不同戏曲曾经是那么彼此交融，互通有无。

我在童年时代就是看着这些野台戏长大的，而我祖母除了看这些野台戏外，也会带着我去仅存的传统戏园看戏。不识字的、全身老唐装打扮的她那一代妇女，就是靠着这些传统戏曲

蓄积着她们的民族因素。她们或许不知道当代知名人物，但是戏曲舞台上的古代人物如关公、吕布、山伯、英台却都耳熟能详。他们与其他中下阶层的市民一样，是庙宇的忠实信众。或许就是靠着这些较不现代化的信众，庙宇及其民族因素才能躲过日据时期由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造大潮，以及光复后的严苛管制，而存活下来。

如此，战后新生代竟然与前清遗老隔代挂了钩。也许就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因素，国民党政府带来的一套现代民族教育遂能顺利地接榫。在战后台湾的特殊环境下，上层的现代民族国家教育与下层的传统地方民俗文化本是钟鼎山林，上下互不干涉，而我们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却能够游移其间。

然而，我们所接受的中华民族教育与我父母那代人所接受的日本殖民教育，虽说同属现代化范畴，却有着情感上的不投契。我父母那代人的现代化启蒙来自日本的殖民，没有经历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历史，光复之后又发生了悲剧性的“二二八”事件，以致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那套民族思想十分疏离。这种疏离感多多少少传染给了子女，但我们却通过民俗文化中的民族因素与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教育接上了线。这里似乎有个国家与文化的分合辩证关系。

六十年代的台湾青少年在这种错综矛盾的情境下成长，他们会寻找什么样的出路呢？

三

就在妈祖绕境“硝烟迷漫”的氛围，以及学校民族教育的灌输中，那时的青少年学生又开始感受到另一种文化景象的冲击。

在经历了五十年代的严厉气氛之后，台湾从六十年代开始有个出版的荣景：不仅冒出许多新的出版社，大量出版新书与丛刊；不少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也开始大批翻印他们二三十年代在大陆时期的老书，涵盖了当时的各种思潮与论战。这种景况有如一场思想的盛宴，带给当时台湾的青少年另一类重要启蒙。而这是我们父母辈未曾经历过的。

经历过六十年代的有心的青年学子，当还记得柏杨批判传统的“酱缸文化”、讽喻警察的“三作牌”这些攻击言辞，还有李敖追求青年个性解放、要求“老年人交出棒子”的呼喊。这些是当年众声喧哗中声音最大的，主要的诉求是反权威、反传统、追求个性。这些带着叛逆因子的主张正好投合了战后新生代进入反叛期的青少年的成长需求。

六十年代也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与思想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一环，不仅经由翻印的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在台湾重新出现，还借着《文星》杂志的“中西文化论战”，让当年的中国现代化路线之争在台湾得到重演，这一切有若在为战后新生代补中国近代史的课。李敖等人

当时以全盘西化派的姿态及泼辣的文笔挑战对手，他们的观点与视野虽没超过五四时期，而且其中也充满各自隐讳的政治意图，却无损于这是一次中国现代化议题的实质论辩，无损于这是一次台湾迟来的五四的重演。

但是这些补课与重演却都必须限制在当时亲美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是读不到左翼阵营参加这些论辩的图书文字的，我们学习到的只能是五四丰富意涵中的有限面向。不仅如此，我们对日据时期台湾左翼前辈的活动也毫无所知，甚至连林献堂等人较为温和的抗日活动也不见诸当时的出版文字。

六十年代又是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开始全面影响台湾的年代，欧美青年那时对既有体制的造反行动和文化如反越战、民权、嬉皮、摇滚乐及新潮电影等，大量传入。台湾的文艺青年在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同时，也如饥似渴地接受全球青年造反风潮的感染。加上台湾是美国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前哨，驻台美军与来台休假的越战美军也带来一番美式风光。除了美国新闻处图书室成了学生朝圣之地外，全部英语广播的美军电台更是大家聆听“上国”之音的重要频道，而其中有不少是带着叛逆因子的西洋流行音乐节目。因此，欧美青年运动除了带来政治方面如反越战与民权运动的冲击之外，还有着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经由音乐、书刊、影像的传布，美国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从花童、嬉皮、摇滚乐到嗑药等等潮流，也感染了那个年代的台湾知识圈。这是来自盟邦“上国”而能穿透管

制的一些左翼因素。而与此同时，“现代化”在年轻人心目中戴上了神圣光环，以美国为标杆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现代化理论”，也在台湾的知识圈开始发声。

于是只能间接感受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余威的台湾战后新生代，在接受民族精神教育之余，竟在六十年代台湾文艺思想的复兴风潮中汲取了另类的丰富养分。其中除了个性解放、现代化的理念外，也开始有一些左翼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虽然是以颇为隐讳的方式呈现。

四

台湾的战后新生代在五六十年代先后接受了民族精神的教育，以及五四运动的补课（虽说只是其中的一个片面），其中有一个核心的认识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这个身份对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青少年来说，像是呼吸空气那样的自然。在那冷战的严峻时代，台湾就是中国的代表，中国就在台湾。青少年的宏图大志是以全中国为范围的，如我的同学所组织的丹心会即志在恢复汉唐雄风。一叶秋海棠是我们筑梦的天地。

那时的知识青年写文章搞活动都是言必称中国人的，例如一九六三年发生的自觉运动。那年五月一个美国的“留华”学生狄仁华在回国前夕写了一篇文章《人情味与公德心》，登在报纸上引起极大回响。这篇文章讲的是中国人有很丰富的人情，却缺乏公德，普遍存在像自私自利、上车不排队、考试作弊等

行为。很多青年学生的自尊心遭受打击，于是提出了“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等诉求，并在台大发起了旨在“自我改造”的运动，该运动遍及了全台湾的大专院校以及一些中学。那时我读小六，正面临初中联考的压力，也天天密切注意报上的消息，深受感染。后来发起保钓运动的王晓波，那时还是高三学生，也同样面临联考压力，却奋不顾身地参与了进去。这个运动最后被命名为“中国青年自觉运动”，虽然只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台湾。

这种中国人的认同意识俯拾皆是，例如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台大学生报纸《大学新闻》上有篇评论白景瑞电影《新娘与我》的文章，标题是《给中国电影界的一帖药方》；另一篇《中国人要什么》的文章则主要在谈台湾社会的缺漏；某个学生社团请了外国留学生来座谈他们“对中国青年的感想”，有位学生则以《一个现代中国青年的平心而论》进行回应；而在一篇政治评论中，学生也以《谁是中国的主人》来自我定位。

这一切意味着，我们这些战后新生代在成长与受教育的时期，说出“我们中国人”是毫无心理障碍的。不管后来变成什么派，中国民族教育曾经是这代人成长时期接受现代启蒙的起点，革命救国的理念深植于心。即使自由派也是师承上一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那匮乏的，一切都巴望着美国、日本的年代，中国的民族情怀是这代人青少年时期的精神初恋。

五

到六七十年代之交，台湾战后新生代在精神层次上既满怀丰沛的民族情怀，也渴求个性的解放，而在心理底层，则有着地方民俗与殖民遗留的潜流。在这样错综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战后新生代对现实环境是充塞着不满与批判的：一方面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启动，社会变动激烈；另一方面在美日的现代化标杆下，“国府”的统治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尤其在政治管制与行政效率上。如此便到了钓鱼台问题浮出台面的时刻。

在六十年代末，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几个英雄好汉如殷海光、李敖、陈映真、柏杨等人，或者已经去世，或者身系囹圄。六十年代中期参与自觉运动的那批人也大都毕业离校或出国留学，校园几乎一片沉寂。然而就在进入七十年代之际，美国宣布将琉球群岛以及钓鱼台列屿交给日本的计划，竟然就在太平洋两岸的校园同时触发了保钓运动。这场海内外有如惊蛰般的运动，可说是台湾战后新生代在累积了六十年代能量之后的一次爆发，也开启了台湾此后不同的政治走向。

一九六九年秋天，我从充满着地方民俗文化的老城台南来到台北上台湾大学，翌年加入有着批判传承的大学论坛社。一九七一年春天，我随着论坛社的弟兄卷入了保钓运动，也在随后两年的时间里被保钓的后续威力所拉扯，直到毕业离校。《青春之歌》一书即是我从六十年代高中时期到七十年代大学

时代，以保钓运动为重心的一群台湾知识青年的记录。

我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为《青春之歌》一书搜集资料，寻访老友，整理回忆，并着手书写，而在二〇〇一年定稿出版。那时距离书中故事已有三十年时光，虽说很多东西已经时过境迁，但更多的情境却是与书写时的当下现实息息相关。书写的那几年正是民进党取得政权的关键时刻，台湾在历经保钓运动的三十年后，竟然发生了如此的政权转换，而且上台的是一个对保钓抱着事不关己甚至敌意态度的政党。这当然也影响到我书写时的心情，于是将这个巨变回溯到三十年前台大学生在保钓之后的一场重要论辩“民族主义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局限于校园，并未带来立即的社会影响，却是代表着当时不同立场的战后台湾新生代知识青年对中国与两岸问题的第一次交锋。

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底的那场论战中，保钓派师生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场受到了台独派、自由派以及国民党派学生的质疑与围剿。那时台湾正处在中国大陆重返联合国以及中美开始和解后的极度焦虑不安状态中，各种立场的人争相发言。接着就发生了台大哲学系事件，将两年多来的校园躁动画下了句点。

撇开统独立场，那场论战也代表着追求国家自主的反帝民族主义，与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这是三十年后我在写作此书时的重新认识，我也试图在书中厘清当时会有如此思想变局的历史与国际因素。

六

从李登辉真正掌权到陈水扁接续当权的那十多年，是台湾分离主义的最高峰，也大约就是我开始书写《青春之歌》到书写《寻找大范男孩》与《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的这段时期。台湾社会几乎所有的论述，包括传媒与教科书，无不望风披靡，卷入去中国化的潮流。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苏东集团解体、美国独霸、新自由主义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对于这场大潮两岸皆无能回避，相率竞逐其间。

在这大潮下，分离主义在其去中国化的论述中，也竭尽所能抬高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贡献，例如，纪念嘉南大圳的设计者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二〇〇八年五月八日马英九在当选而尚未就任之际，曾前往南台湾乌山头水库参加一场“八田与一技师逝世66周年追思音乐会”。翌年同一天，他以正式身份又去参加了67周年的追思音乐会。八田与一是谁？

八田与一是日据时期来到台湾参与并负责各项水利建设的工程师，他负责的水利工程中最有名的是乌山头水库及其引水灌溉嘉南平原的嘉南大圳。一九四二年日本攻占菲律宾，他以陆军专员身份被派遣去调查水利设施，因所搭船只遭美军潜艇袭击沉没而亡。八田与一作为一个爱国者，对日本帝国诚然尽心尽力，包括在日本帝国“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下，增产台湾的米粮来供应帝国所需，最后也算是战死沙场。他作